

# 泛指性量詞“枚”與“个”的比較研究\*

焦毓梅\*\*

---

## ◁ 목 차 ▷

---

- I. 引言
  - II. 泛指性量詞“枚”與“个”的來源及早期用法比較
  - III. 泛指性量詞“枚”與“个”兩漢時期用法比較
  - IV. 泛指性量詞“枚”與“个”六朝時期用法比較
  - V. 泛指性量詞“枚”與“个”隋唐五代時期用法比較
  - VI. 結語
- 

## I. 引言

具有豐富的個體量詞<sup>1)</sup>和較完善的個體量詞系統是漢語的重要特徵之一，然而這個系統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存在的，而是經歷了由萌芽、發展直至豐富的漫長過程。目前的研究認為，在個體量詞的發展過程中僅出現過“枚”和“个”兩個泛指性量詞，比較它們的產生、發展、以及在量詞系統中的作用，在漢語量詞發展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目前，對量詞“枚”的歷時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來源及可應用名詞範圍變化的研究上。如張萬起先生（1998年）在《量詞“枚”的產生及其歷史演變》一文中，對“枚”的產生和歷時演變作了考察，指出量詞“枚”產生於漢代，在魏晉南北朝時代成爲泛指

---

\* 本研究得到德成女子大學2015年度研究經費支持(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the Duksung Women's University Research Grants 2015)。感謝三位匿名評審提出的寶貴意見。

\*\* 德成女子大學 中語中文學科 助教授

1) “個體量詞”是名量詞的一個子類，是相對“集合(集体)量詞”而言的。現代漢語中個體量詞大多爲類別詞(如條、根、張)，由相關名詞或動詞虛化而來，具有一定的形体特征，在表量的同時兼有按照形體特征將名詞分類的功能。

性量詞，可以廣泛地用於樹木以外的其他事物，幾乎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李建平、張顯成先生（2011年）《從簡帛文獻看漢語量詞系統建立的時代》則認為泛指性量詞“枚”在漢初已廣泛應用，漢代中期臻於成熟，到漢末三國時期所計量事物幾乎全部可以用量詞“枚”來稱量。因量詞“个”是現代漢語中應用範圍最廣的量詞，相關研究也更為豐富，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對其語源、涉及名詞範圍擴展及其語法化的研究上，而且研究結論也常大相徑庭。如洪誠先生（1963）《略論量詞“個”的語源及其在唐以前的發展情況》，認為“个”源自“介”，在上古即為泛指量詞，兼及人、物，從魏晉起，个、箇、個音義方才統一；游汝傑先生（1985）《漢語量詞“个”語源辨析》則認為量詞“个”不可能從形容詞“介”演變而來不可能是從表“偏”義的“个”演變而來。另外，陳紱先生（2002）《從“枚”與“個”看漢語泛指性量詞的演變》以“枚”和“个”兩個泛指性量詞為例討論漢語泛指性量詞的演變，指出“枚”經歷了一個從窄到寬，又從寬到窄的變化過程；而“个”卻是從窄到寬之後變得越來越寬，論文在對演變過程的描寫仍偏重涉及名詞範圍變化，且涉及語料受限，部分用例也有待商榷之處。

本文嘗試從個體量詞系統建立的角度，對“枚”與“个”各個歷史階段發展的具體情況進行更細緻的論述，嘗試描寫其發展演變與整個量詞系統發展的關聯，尤其關注其與“數量+名”結構發展之間的關聯狀況，從而進一步理清這兩個量詞的發展脈絡，對其產生與興替的動因作出科學解釋提供參考依據。

## II. 泛指性量詞“枚”與“个”的來源及早期用法比較

### 1. 泛指性量詞“枚”與“个”產生的背景

量詞“枚”與“个”萌芽于先秦，這個時期表達數量概念時以不使用量詞為常態，當必須使用量詞（如度量衡、集體量詞、臨時量詞等）的時候，則根據不同語境分別採用“名+數量”和“數量+名”結構。這一時期個體量詞極為罕見，僅有的幾個也主要是與集體量詞相對使用，表示物體單一數量的量詞，與名詞形貌特征相關的量詞尚未產生。<sup>2)</sup>

2) 先秦時期“名+數+名”結構有較多用例，我們這裡認為結構中後一名詞不是量詞，如“隶

### 1) “名+數量”結構與“數量+名”結構

現代漢語數量結構以使用量詞為常態，有“數量+名”和“名+數量”兩種數量結構，前者為優勢語序。而在先秦時期，表達數量概念時以不使用量詞為常態，“數+名”、“名+數”結構並行，“名+數量”和“數量+名”也有一定數量的用例，其中的量詞主要是度量衡、集體量詞、臨時量詞。對文獻相關用例統計情況來看，“名+數”使用頻率較“數+名”高，而“名+數量”較“數量+名”高，如《國語》<sup>3)</sup>：

結構	名+數	數+名	名+數量	數量+名
出現頻次	30	213	36	13

使用頻率的差異與史書語料以敘述性內容為主相關：“數+名”結構一般構成名詞性短語充當句子主語或賓語等成分，多出現在一般敘述性語境中，因而使用頻率也高；“名+數”結構常為“主語+述語”單獨成句，多出現在統計、列舉或數量對比的語境中，因而使用頻率也較低。

使用量詞的結構情況相似，“名+數量”常構成“主語+述語”結構，用於物品數量的統計、列舉，“數量+名”結構則多用於敘述，只是因量詞更多出現在數量統計、列舉的語境中，因而“名+數量”使用頻率更高。

### 2) 個體量詞情況

現代漢語個體量詞中除泛指性量詞“個”以外，主要涉及兩類量詞：一類是具有類別特征的，如“條、根、張”等，專用於具有某一形體（或抽象）特征的同類名詞，大多由相關名詞或動詞演化而來<sup>4)</sup>，在表量的同時兼有按照形體特征將名詞分

妾二人”（《睡虎地秦簡》）中“人”為名詞。另外“張”僅見於“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左傳》），此外別無用例，疑其仍為動詞。

3) 引自馮雪燕《古漢語數量結構研究》。

4) 這一類量詞是漢語個體量詞系統的主體，由於同一事物可能具有多個突出特征，所以同一名詞可同幾個量詞搭配使用的現象非常常見；這類個體量詞也有少數由含有“單獨或分割”義的詞演化而來，但其常用於形體特征不鮮明的同類事物，如量詞“件”用於特征抽象的“事”、“物”或物類（如家具、工具）等。

類的功能；一類是與集體量詞相對使用，表示一套或一組中的一個，如與“套”、“雙”等相對的“隻”<sup>5)</sup>，大多由含有“單獨或分割”義的詞演化而來。

泛指性量詞“枚”與“个”均產生于先秦時期，這一時期以不使用量詞為常態，個體量詞系統尚在萌芽時期，個體量詞極為罕見，主要是與集體量詞相對使用的一類<sup>6)</sup>，一般認為出現在先秦的個體量詞只有“匹”、“兩(輛)”等幾個。

試考察這一時期的個體量詞，發現其通常只是一組量詞中的一個，其標明數量的用途仍非常明顯，且多用於“名+數量”結構，如“匹”用於稱量馬，看似與現代漢語相同，但先秦稱量馬常用的量詞並非僅有一個“匹”，還有“麗”指兩匹一組、“乘”指四匹一組、“駟”指四匹一組，如：

- (1)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周禮》
- (2) 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于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國語·晉語》
- (3)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左傳·宣公二年》

而且，從出現頻率看“匹”并不佔優勢，檢索CCL語料庫先秦部分“匹”有12例，“乘”10例，“駟”12例，“麗”2例，顯然“匹”只是一組常用量詞中的一個，其語義指“單匹”。從檢索結果來看，“匹”出現的12例均為“名+數量”結構，現代漢語中的“數+匹+馬”在這一時期只用“數+名”表示，如：

- (4)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今文尚書》
- (5) 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莊子》

這主要是因為量詞“匹”基本只出現在統計、列舉或數量對比的語境中，顯然這一時期出現的個體量詞主要用於數量為語義焦點的的語境中。

“枚”與“个”即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量詞(或者近似于量詞)的用法，其用法也不

5) 這一類量詞最常用的是“隻”和“件”，如“一雙鞋VS一隻鞋”；“一套家具VS一件家具”。

6) 先秦時期用於計量同類事物時常用表示類名的名詞組成“名+數+類名”的結構，有較多用例，如“隸妾二人”《睡虎地秦簡》。這一用法，隨著“數+量+名”結構的增加而消失，本文認為表示類名的名詞仍為名詞，而非個體量詞。

可避免地受到這一時期量詞特點的影響。

## 2. 量詞“枚”的來源及其早期用法

“枚”的本義為“榦”，指樹木的枝幹，從其早期名詞用法（如銜枚、枚卜）來看，應為“小枝”，可作“算籌”。

從先秦時期傳世文獻情況來看，自西周直至春秋時期基本未見“枚”為量詞的用法，最接近量詞用法的例子為：

- (6) 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枚數”應為“數量”之義，與現代漢語中“個數”相仿，“枚”疑為量詞，來源疑為其“算籌”義。戰國時期，在《六韜》、《墨子》、《穆天子傳》中，出現了部分用例：

- (7) 方首天搯，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一千二百枚。大柯斧又名天鉞，刀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一千二百枚。方首天捶，重八斤，柄長五尺，一千二百枚。（《六韜·虎韜》）
- (8) 二步置連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二步積苙，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弟，襲示端，堅約弋。十步積搏，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百步一積雜稊，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墨子·備城門》）
- (9) 祭父自圃鄭來謁，留昆歸玉百枚。（《穆天子傳卷五》）

“枚”搭配的名詞涉及的物品種類不一，形狀各異，且文獻中出現了“枚數”這樣的用法，故認為其适用于不同物品的計量。從早期用例來看，“枚”并未用於計量樹木，故認為其不存在由專用於樹木的量詞變成泛指性量詞的泛化過程。

這一時期所見“枚”作量詞的例句中，除作度量單位外，其用法均為“名+數量”，尤其以單獨構成“主語+述語”小句的情況最多，《墨子》與《六韜》中全部例子均屬此類，且用例均對所計量的名詞大小、長度等數據有詳細的描寫，屬於典型的統計語

境，僅有《穆天子傳》中的1例用爲動詞之後的賓語。

### 3. 量詞“个”的來源及其早期用法

“个”的來源更複雜些，先後有“个”、“箇”、“個”三種形式出現，“個”和“箇”在漢以前的典籍裏面沒有出現過，但至遲到東漢時期三者已混用無別。

量詞“个”早在《禮記》、《左傳》中已有使用，但其來源多有爭議，據洪誠（2000）、呂叔湘先生（2002）考証：“个”的語源爲“介”，本義爲“獨特”，曾是“介”的簡筆字；“箇”本義爲“竹枝”，作爲量詞始見于《說文》，唐宋時漸趨流行；“個”最早見于鄭玄《禮儀注》：個，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云若干個者。

#### 1) “一个”與“一介”

試比較“个”與“介”在先秦時期與數詞連用類似量詞的用例。從語料庫中檢索到“介”5例，均爲“一介+名詞”，且其中名詞均爲“人”<sup>7)</sup>：

- (10)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琦，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尚書·秦誓》）
- (11) 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其掃以咳姓于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匱以隨諸禦。（《國語·吳語》）

同時還發現“一介”與“一个”有混用的現象，如：

- (12) 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左傳·襄公八年》）
- (13) 楚有君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左傳·哀公二十七年》）

這些例子中的“一介”顯然不是普通的數量短語，其語義更偏重于“單獨、孤獨”的

7) 這一用法一直沿用到近現代漢語中，指一個人，含有渺小、卑微的意思，常用於自謙。

意思，“一个”能與之混用可能是由於其字形相近。而“个”作為量詞的其他用法，“介”都不具備。

## 2) 量詞“个”的早期用法

從語料庫中檢索到“个”的10余個相關用例<sup>8)</sup>，主要可以分為三類，一類中“个”類似於“份”區別於完整的個體量，如(14)例“X个”指分割的X份牲畜肉，(15)例中“鹿皮四个”指四塊不完整的鹿皮：

- (14)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禮記·檀弓下》）
- (15) 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綦以為奉，鹿皮四个；諸侯之處垂橐而入，捆載而歸。（《國語·齊語》）

第二類中“个”類似於“次”，(16)例中“每一个”指“每射中一次”，例(17)中“弱一个”指“削弱了一次”：

- (16) 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余筭，則反委之。（《儀禮·鄉射禮》）
- (17) 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左傳·昭公三年》）

第三類中“个”類似於現代漢語中的“个”，可見用於“箭”、“獸”、“肩”等物的例子：

- (18) 負矢五十个。（《荀子·議兵》）
- (19) 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群皆奔，王其無方收也。（《國語·吳語》）

8) 《三禮》中多有“个”指箭靶上下伸出的部分。箭靶稱為侯，靶若以布制成，中間的主體部分叫作中；中上下各橫接一幅，叫作躬；接于躬上，上下伸出兩旁的部分，叫作舌，也叫作个，上舌寬，下舌窄，如“南面揖，皆少進。當福南，皆左還，北面，搯三挾一个。（《儀禮·鄉射禮》）

(20) 廟門容大局七个，闈門容小局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周禮·考工記》）

綜上所述，“一介”在這一時期顯然並不是一般的數量短語，但其位置很容易變化為“數+量+名”結構中的量詞，且“个”與“介”音形相似，極易混用。“个”作為量詞使用範圍比“枚”更廣，它可與“枚”一樣用於個體物品的稱量，也可用於由整體分割成的部分的稱量，甚至出現了接近動量詞的用法，且其少見於統計語境多見於一般性敘述描寫語境。

### Ⅲ. 泛指性量詞“枚”與“个”兩漢時期用法比較

#### 1. 兩漢時期個體量詞的發展情況

兩漢時期是漢語由上古向中古過渡的時期，也是個體量詞系統發展的過渡時期，個體量詞的數量不斷增長，黃盛璋先生統計，兩漢時代的個體量詞達到了54個<sup>9)</sup>，兩漢歷經400多年，就量詞產生的數量來說，晚期比早期多。

與先秦時期不同，這一時期產生的個體量詞大多為表現名詞形貌特征的量詞，個體量詞的分工已初步出現，如牛羊用“頭”，有領子的上衣（如衣、袍、裘、襦、衿等）用“領”。但大部分名詞仍沒有與之相配的個體量詞可用。自西漢至東漢，數量結構中使用量詞的比例越來越高，但量詞特別是個體量詞的使用仍比較隨意。從使用頻率上看，“數量+名”結構的用例逐漸增加，但“名+數量”結構仍占絕對優勢。

到東漢時期，部分文獻中數量結構使用量詞的超過了不用量詞的，如《漢書》<sup>10)</sup>：

結構	名+數	數+名	名+數量	數量+名
出現頻次	785	570	1712	74

9) 黃盛璋《兩漢時代的量詞》，中國語文，1961年8月。

10) 引自馮雪燕《古漢語數量結構研究》。



## 2. 量詞“枚”兩漢時期的用法

“枚”在這一時期仍然只用於“名+數量”結構，且多用於單獨構成“主語+述語”的小句，也說明“枚”仍然主要應用於統計類語境。

這一時期“枚”作為個體量詞，數量逐漸增加，一般文獻中有一定數量的用例，在簡帛文獻中數量更多，這主要是因為簡帛文獻中清單、賬冊之類需要記錄、統計物品數量的情況更多。

綜合考察這一時期文獻，發現“枚”可搭配的名詞主要有五類<sup>11)</sup>：

一，與先秦相同，形制不一，無法歸納其共同特徵的各種器物，尤其以日常器具為多，如各類器皿、小型樂器、撲滿、香爐等等。

二，規定形制的“錢”以及與錢特徵接近，具有〔+小圓〕特徵的物品。推行統一貨幣政策雖始自秦，實際上直至漢代圓形方孔錢幣才真正成為通行的貨幣。這一新興又必須經常性計量的物品與這一時期通行的量詞“枚”組合。這一組合迅速擴展到與之具有相同特徵的物品（如珠、豆、藥丸等），並沿用至今。

三，在同類事物中，特徵不突出，居於邊緣位置的事物，如動物類中的“鳥”、“龜”、“魚”，衣物類中的“席”、“巾”等。

四，同類器物的統稱，如木器。

五，可用於樹木<sup>12)</sup>。

發現“枚”基本上不可搭配的名詞主要有四類：

一，已經有較為固定個體量詞的名詞，如先秦時期即有固定量詞搭配的“馬”、“車”等，均不用“枚”。

二，在一類事物中特征突出，居於核心地位，如動物類中的“牛”、“羊”，“衣物”類中的“衣”大多不能用“枚”稱量，這也是最早產生表示形體特征量詞的部分名詞。

三，“人”大多仍採用“名+數+人”的結構，不用“枚”。

四，其他抽象事物如“事件”、“時間”等均不用個體量詞。

11) 根據本人《泛指性量詞“枚”的歷時演變研究》相關統計。

12) 樹木用“枚”僅見於《漢書》和《後漢書》，其他文獻可見多例用新興量詞“株”稱量的。

### 3. 量詞“个”兩漢時期的用法

“个”在這一時期文獻中用例極少，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的簡帛文獻中都罕有用例。關於漢代“个”的使用情況，基本上只見於辭書或是古書的註解。前人多有引證，不煩重述，基本可以認定的事實是：一，“个”、“箇”、“個”三者到東漢時可相通混用；二，“个”與“枚”意義相近，具體稱量名詞範圍不詳，用法不詳，在口語中使用情況不詳。

從文獻中可見用例來看，“个”、“個”用例罕見，“箇”基本都與“竹”相關，多出現在數學書中，如：

- (21) 有出錢一萬三千五百，買竹二千三百五十箇。問箇幾何？答曰：一箇，五錢四十七分錢之三十五。（《九章算術》）

其他史書等傳世文獻中僅《史記》中有1例：

- (22)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瓊，漿千甌，屠牛羊彘千皮，販谷糶千鐘，薪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箇，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史記·貨殖列傳》）

以上可見用例，均用於“名+數量”結構，用於統計、列舉數目的語境中，與一般個體量詞無別，或許可以認為它只是一個用來稱量“竹”的專屬量詞，與先秦“个”沒有太多關聯，而先秦時期“个”的用法在文獻中並無反應。

## IV. 泛指性量詞“枚”與“个”六朝時期用法比較

### 1. 六朝時期個體量詞的發展情況

六朝時期是漢語量詞大發展的時代，個體量詞數量進一步增加，據劉世儒先生統計魏晉南北朝有120多個個體量詞，其中絕大部分為表形體特征的量詞，現代漢

語常用的部分量詞在這一時期也產生了。同時更多的名詞開始按照各自的形狀特征分類共用同一量詞，量詞的分工進一步明確，並開始固定下來。

個體量詞的使用不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大部分情況都要用了，越是口語程度高的文獻“數”、“名”直接結合的比例越低。“數量+名”結構在這一時期也在繼續發展，雖所佔比例還不高，但在史書和口語文獻中均有一定用例。

統計史書類文獻《三國志》中的情況如下<sup>13)</sup>：

結構	名+數	數+名	名+數量	數量+名
出現頻次	180	418	498	4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數量+名”結構仍然主要用於數量為焦點的語境中，“名+數量”結構則出現了較多用於一般性敘述語境的用例，如：

(22) 取醋石榴兩三個，擊取子，搗破。(《齊民要術·作燕脂法》)<sup>14)</sup>

## 2. 六朝時期量詞“枚”的情況

這一時期“數量+名”結構使用頻率不斷提高，“枚”的使用頻率也大幅增加，但“枚”基本上只用於“名+數量”結構，出現在數量為語義焦點的語境中，極少出現在“數量+名”的結構中。

“枚”在六朝時期涉及名詞範圍，前人多有研究。張萬起先生認為：在魏晉南北朝時代量詞“枚”發生了泛用和虛化。“枚”可以廣泛地用於樹木以外的其他事物，甚至於一些動物。所謂樹木以外的其他事物，包括各種器物、用具、兵器、錢幣、金玉珠寶、衣被服飾、印章璽綬、花草植物、瓜果子實、面類食品、磚土瓦石、建築物等，幾乎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sup>15)</sup>

13) 引自馮雪燕《古漢語數量結構研究》。在較《三國志》時代更晚、口語性更强的文獻中，使用量詞的比例也更高。

14) 此例為敘述制取胭脂的過程，其中“兩三個”是表示大約數量的概數，顯然不是敘述的焦點。

15) 引自張萬起先生《量詞枚的產生及其歷史演變》。根據對先秦及漢代語料的考察，可以知

考察這一時期語料發現，與東漢時期相比，“枚”的用例大量增加，所涉及名詞也確如張萬起先生所說包含了各類物品，但並非“無所不包”。可搭配名詞範圍與東漢相比有所改變，有擴展也有收縮，試將這一時期“枚”所搭配的名詞分類加以分析：

一，與前代相同，形制不一，無法歸納其共同特徵的各種器物，仍然使用“枚”。這一類器物比前代涉及物品更加龐雜，這一時期新出現的物品大多用“枚”。除器皿外還有形狀不一的樂器、傢俱、香燭、簡冊、囊袋、席墊以及祭祀或裝飾用的小像，做鋪墊之用的獸皮、類似釘子的“細腰”都可用“枚”。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這些器物中有一部分因其具有的某一特徵也可歸入其他類，所以也可使用其他量詞，如“席”可用“領”、“筆”可用“枝”；其次，器物僅限於小型的雜物，較重要的物品（如樂器類中的“琴”用“張”）、較大型的傢俱（如“屏風”用“床”或“扇”）等均不用“枚”。

二，漢代“枚”可用於規定形制的“錢”以及與錢特徵接近，具有〔+小圓〕特徵的物品。這一類範圍得到了明顯擴展，凡圓形或近圓形的幾乎都可用“枚”了。最主要的是有關植物果實或子實的都用“枚”，果實類如：桃、梨、瓜、橘、棗、梅、益智、芭蕉等；豆類如：赤豆、巴豆等；子實類如：胡椒、瓜子、附子、葦撥等；核仁類如：桃人、棗核中人等。另外，還增加了與“錢”、“珠”形似的“餅”、“雞子”、“卵”等圓形物，“狸腦、羊毗”<sup>16)</sup>等大略呈圓形的，亦可用“枚”。

三，漢代“枚”可用於在同類事物中特徵不突出，居於邊緣位置的事物，這一時期仍可用“枚”，但用例有所減少，且大多同時可用表形體特徵的量詞，如動物類中“魚”仍可用“枚”但用“頭”的例子更多見。

四，漢代“枚”可用於同類器物的統稱，這一時期仍用“枚”。

五，漢代“枚”可用於樹木，這一時期樹木幾乎全用量詞“株”，“枚”幾乎沒有用例。

與漢代相比，“枚”雖用例急劇增加，但使用範圍並無明顯擴展，仍然多用於日常物品，“人”和“事件”、“時間”等抽象事物仍不可用“枚”，已經有比較固定個體量詞的

道“枚”并非由專指樹木的量詞泛化而來。

16) 均只有1例：〔狸腦〕取狐兩目，狸腦大如狐目三枚，搗之三千杵，塗鼠穴，則鼠去矣（《齊民要術·養蠶法》）。〔羊毗〕羊節解法，羊毗一枚，以水雜生米三升，蔥一虎口，煮之。（《齊民要術·羹臠法》）

一般都不再用“枚”。

### 3. 六朝時期量詞“个”的情況

從使用頻率上看，“个”在文獻中的用例遠不及“枚”，但其使用範圍遠遠超過“枚”，可用於“名+數量”結構，也可用於“數量+名”結構，可用於一般敘述性語境，也可用於數量為焦點的語境，如：

(23) 莫惜床頭百个錢。(鮑照《擬行路難》)

(24) 納瓜子四枚,大豆三个,于堆旁向陽中。(《齊民要術·種瓜》)

“个”在六朝時期涉及名詞範圍遠遠超過了“枚”：

一，“枚”可使用的兩個主要範圍內均可見“个”的用例，“个”可用於稱量各類器物，如盞、鏡，可用於錢幣、果實以及大略呈圓形的，很多時期二者混用無別(如例24)：

(25) 挾者，鏃作獨樂及盞。(《齊民要術·種榆白楊》)(用於“器物”)

(26) 取醋石榴兩三個，擘取子，搗破。(《齊民要術·作燕脂法》)(用於果實)

(27) 治牛病：用牛胆一个，灌牛口中，差。(《齊民要術·養牛馬》)(用於大略呈圓形的)

二，“个”不僅可用於在同類事物中特徵不突出，居於邊緣位置的事物，也可用於稱量特征較為突出的事物，如動物類不僅可用於魚、蟲之類，也可用於“狗”之類家畜：

(28) 藏蟹法：百个各一器。(《齊民要術·作醬》)

(29) 作鯉魚脯法：竹杖穿眼，十个一貫。(《齊民要術·脯腊》)

(30) 且寺內先有數箇猛狗。(王劭《舍利感應記別泉》)

三，未見“个”用於類名的例子，但可用於稱量樹木，如：

(31) 唯善法寺所見光內有兩箇樺樹。(王劭《利感應記別錄》)

四，“个”可用於“人”，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類僅見於“數量+名”結構，“名+數量”結構中則使用“人”，如：

(32) 立文學，學徒八百人。《華陽國志·蜀志》

(33) 但使我在南兩個兒孝順，何憂無物邪。《周書·異域》

自先秦直至六朝前在稱量“人”的時候一直沿用“名+數+人”結構，用類名“人”作為量詞來使用，在一般敘述性語境中則直接用“數+名”結構，沒有出現過“數+個體量詞+指人名詞”的結構，僅有“一介+指人名詞”的結構與之類似，而“个”與“介”字形相近可混用，加之六朝時期量詞“个”稱量“人”僅用於“數量+名”結構的語言事實，或可認為其用於“人”的用法，來自於“一介”。

與“枚”相比，雖用例較少，但使用範圍明顯比“枚”要廣，這一時期，“事件”、“時間”等抽象事物仍不可用“个”。

## V. 泛指性量詞“枚”與“个”隋唐五代用法比較

### 1. 隋唐五代個體量詞的發展情況

隋唐五代時期數量結構使用情況與現代漢語非常接近，一般情況下都要使用量詞，“數量+名”結構使用頻率超過“名+數量”結構成為優勢語序結構，且一般情況下用“數量+名”，“名+數量”結構只用於數量為焦點的統計類語境，如：

(34) 覓得一條長鐵棒，填間呵責盡頭槌。《敦煌變文集·地獄變文》

(35) 火急交人(拆)車，人執一根車輻棒，打(打)着從頭面奄沙。《敦煌變文集·李陵變文》

(36) 南北大梁二根。……。椽二千九百九十根。(高宗《定明堂規制詔》)

(37) 是時續有敕旨：賜遠公如意數珠串，六环錫杖一條，衣著僧衣數對，

兼將御輿，來迎遠公入內。《敦煌變文集·廬山遠公話》

“名+數”結構基本消失，“數+名”結構用法與現代漢語相同<sup>17)</sup>，只是出現頻率高得多，如：

(38) 万邦受命，行性淳直。《敦煌變文·伍子脊變文》

(39) 我交一磕睡神下界，令百人盡皆昏沉，即便相隨，有何不得？《敦煌變文·八相變》

考察這一時期語料，統計劉堅、蔣紹愚先生主編《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匯編·唐五代卷》相關用例如下<sup>18)</sup>：

結構	名+數	數+名	名+數量	數量+名
出現頻次	0	1301	174	351

這一時期，個體量詞迅速發展，現代漢語中很多常用量詞都在這一時期成熟，如用於〔+長條〕物的“條”，用於〔+平面〕物的“張”，用於〔+動物〕和〔+小型〕器物的“隻”、用於〔+顆粒〕物的“粒”、用於〔+塊狀〕物的“塊”等均與現代漢語極為接近，另有量詞“事”類似於現代漢語中的“件”可用於各種器物和用具，也可用於一類器物的通名或若干類器物的混合。

比較“枚”與“个”的使用頻率，發現“枚”的優勢地位已經完全喪失，試檢索CCL語料庫這一時期文獻部分常用量詞情況如下<sup>19)</sup>：

17) “數+名”結構中數詞、名詞多為單音節詞組成雙音節結構，主要用於較正式的書面語，在口語中多為“一+名詞”。

18) 統計中“數+名”結構用例較多，主要是因為“X人”反復出現次數較多，就這一時期整體面貌來看，使用量詞成為常態。

19) 五代時期主要檢索《祖堂集》和《敦煌變文集》兩部口語性較強文獻。

時代	枚	个	條	張	隻	粒	顆
隋唐	60	223	37	11	22	15	14
五代	8	840	10	4	14	11	7

## 2. 隋唐五代量詞“枚”的情況

“枚”的用法與前代基本一致，仍主要用於“名+數量”的結構，用於“數量+名”的極為罕見，在CCL中檢索到60例，其中只有2例，且都見於《王梵志詩》：

- (40) 只用四片板，四角八枚丁。（《王梵志詩》）  
 (41) 如此硬窮漢，村村一兩枚。（《王梵志詩》）

“枚”搭配名詞範圍基本沒有擴展<sup>20</sup>，涉及範圍似乎與前代並沒有太大區別，其使用頻率降低主要是因為隨著新興量詞的發展，個體量詞系統的成熟，其使用空間被其他量詞侵蝕，所涉及名詞大多可用其他量詞<sup>21</sup>，且用其他量詞的比例更高，在後代“枚”基本上完全退出了這些範圍。

與前代相比，“枚”搭配名詞情況如下：

一，前代“枚”最主要應用範圍之一，形制不一，無法歸納其共同特徵的各種器物，這一時期仍有較多用例，除保留前代用法外，又增加了“魚袋”、“香囊”、“燈籠”、“刀子”、“釘子”、“針”等多種器物，但這些事物大多也可用“隻”，“隻”的本義是“一隻鳥”，在南北朝主要用於鳥類，在唐代擴展到其他動物、成雙物品中的一個，尤其是日常用具從小型的器皿、飾物到大型的家具、工具都可用“隻”。前代常用“枚”的小型日常器具都在這個範圍內，如：

- (42) 盛金花銀脚螺杯一隻。（崔致遠《幽州了可舉太保》）  
 壘子五十隻，盤子五十隻。（《濟讀廟北海壇祭器碑》、《金石萃編》）

20) 在這一時期文獻中出現了1個用於“人”的例子（見例41），其他文獻均無同類用例。

21) “錢”等少數幾個名詞仍主要用“枚”，也有用“个”的例子，但不可與其他量詞搭配，這些名詞成爲了“枚”最後的領域。



豈知一隻鳳釵價，沽得數村蝸舍人。（崔營《句》）  
平生心緒無人識，一隻金梭万丈絲。（高蟾《長信宮二首》）

這類物品中也有一些特征突出的，產生了新興的表形狀特征的量詞，如：

- (43) 今絳州口平陽郡貢蜡燭三十條。（《通典》卷第六·食貨六·賦稅下）  
武威郡貢野馬皮五張。（《通典》卷第六·食貨六·賦稅）  
我有一面鏡，新磨似秋月。（貫休《古鏡詞》）  
剃刀一柄施于主舶之神，以沂平歸本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

二，前代“枚”可用於規定形制的“錢”以及與錢特徵接近，具有〔+小圓〕特徵的物品，并進一步擴展到果實、雞子、餅等圓形物上。在這一時期，除“錢”外，其他多用“顆”、“粒”等量詞。

量詞“顆”本義為“小頭”，在南北朝時期即用於形似小圓球的物品，在唐代可用於球型或近似球型的一切物品，如“珠”、“泪珠”、“舍利”、“雞子”、“鷄卵”、“丹（藥）”、“銅印”、“人頭”、“鹽”，以及“桃”、“梨”等圓形果實。“枚”所涉及的以“珠”為核心的小圓類物品、圓形果實、以及日常器物中的小圓型物品均可用“顆”<sup>22</sup>），如：

- (44) 遂贊中宵夢神人施珠一顆。（清畫《唐杭州靈隱山天竺寺故大和尚塔銘（并序）》）  
千顆泪珠无寄處，一時彈与渡前風。（鄭肇《別郡后寄席中三蘭》）  
問里正曰：鷄卵一錢几顆？曰：三顆。（《朝野僉載》卷三）  
頓丘縣有一賢者，于黃河渚上拾菜，得一樹栽子大如指。持歸，蒔之三年，乃結子五顆，味狀如柰，又似林檎多汁。（《朝野僉載》卷三）  
敏求傾首窺之，……，上各有銅印數百顆。（《河東記·李敏求》）

量詞“粒”的本義為“米粒”，在南北朝主要用于糧食類顆粒，在唐代擴展到一般顆粒狀物品都可用，如“舍利”、“丹藥”、“石榴籽”，前代主要用“枚”的豆類、子實類均可用“粒”，如：

22) 直至現代漢語中，“顆”仍用于小或圓的東西。

- (45) 瓜萋(四十九粒)、丁香(四十九粒)、赤小豆(四十九粒)。(李荃《太白陰經》)

三，前代“枚”可用於在同類事物中特徵不突出，居於邊緣位置的事物，這一時期這類名詞基本上都只用表形貌特征的量詞。

四，漢代“枚”可用於同類器物的統稱，這類用法歷代用例都不多，唐代仍有“食器”等例，但一般都用新興量詞“事”，用例極多，如：

- (46) 賜錦彩絞絹四百匹、瓶盤五事、衣二副。(《謝內宴賜錦彩器物等表》)  
天恩賜給前件袍帶告身器物二千事。(陳子昂《上軍國机要事》)  
持白金器數事而遺女。(裴鉞《鄭德磷》)  
特賜清廟器六事。(《故垂相太子少師贈太尉牛公神道碑銘(并序)》)  
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數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唐代個體量詞系統逐漸發展成熟，“條”、“根”、“顆”、“粒”、“張”、“面”等量詞由其本義所具有的形狀特征，分類稱量具有相同特征的名詞；“隻”等詞由本身〔+單一〕義逐漸擴展到可稱量所有單獨器物；“事”因其無特征而發展為可稱量混合類別的器物。

“枚”所稱量名詞範圍被重新分割，新興的個體量詞逐漸取代“枚”在各個範疇的地位，“枚”也隨著喪失了作為稱量某類器物存在的必要性。

### 3. 隋唐五代量詞“个”的情況

“个”在南北朝已經是泛指性量詞，使用範圍比“枚”更廣，但用例較少。到唐代“个”迅速發展為真正的泛指性量詞，其涉及名詞範圍幾乎涵蓋所有同代量詞涉及的名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个”可用於已有固定量詞搭配的各類名詞，如：

- (47) 莫把金籠閉鸚鵡，箇箇分明解人語。(《鸚鵡詞》)

這一時期“个”用於“人”的例子最多，幾乎隨處可見，仍多用於“數量+名”結構，

與“名+數+人”結構並舉，如：

- (48) 曾見當當爐一个人，入時裝束好腰身。(段成式《嘲飛卿七首》)  
越王解破夫差國，一个西施已是多。(盧注《西施》)
- (49) 至驛，令脫靴訖，謂曰：洛州几个參軍？對曰：正員六人，員外一人。(《朝野僉載·卷六》)

這一時期“个”進一步擴展到“時間”範疇，“月”、“日”幾乎必須用“个”，如：

- (50) 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侖儿。(崔涯《嘲妓》)
- (51) 緣无順風，停宿三个日。(《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

“个”在這一時期也擴展到更抽象的話語、事等名詞，如：

- (52) 師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說話。(《筠州洞山悟本禪師語錄》)
- (53) 其僧才得个問頭，眼泪落。(《祖堂集》)
- (54) 价闍黎，承当个事，大須審細！(《瑞州洞山良價禪師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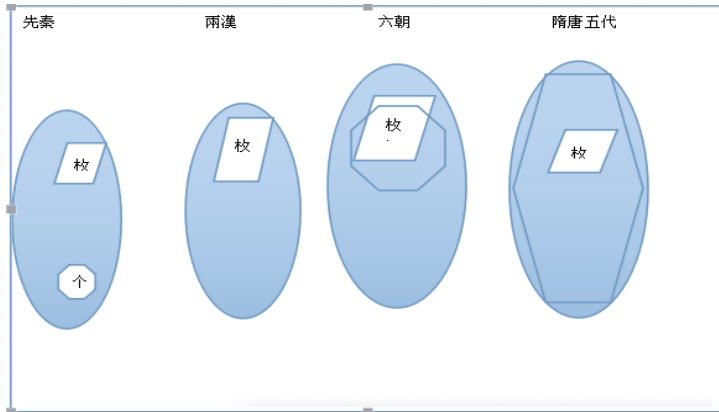
## VI. 結語

1. 量詞“枚”源自其“算籌”義，量詞“个”來源存疑，從考察情況來看，“个”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先秦時期量詞“个”、稱量竹的“箇”、由與“一介”混用的“一个”演化來的“个”等幾個量詞合流的過程。兩個量詞產生伊始即為泛指量詞，沒有從專屬個體量詞泛化為泛指量詞的過程。

2. 量詞“枚”與量詞“个”所稱量名詞範圍比較主要有兩個差別：

1) “枚”主要用於物品尤其是常見器物的稱量，語義上強調“單件”，自先秦直至唐五代都沒有超出這個範圍；“个”的使用範圍從萌芽期就比“枚”更廣，並不限於單件的器物，在經過了幾個詞的合流之後，六朝時期其使用範圍就基本覆蓋了“枚”的範圍，且可用於“人”，到隋唐時期又迅速完成了向其他抽象領域泛化的過程，成為真

正的“通用量詞”；簡單示意如下圖（其中橢圓表示名詞，菱形表示“枚”涉及範圍，八角形表示“個”涉及範圍）：



2) 在個體量詞形成的過程中，表形體特征的量詞逐漸增加，當某類量詞和某類名詞形成較固定關係時，“枚”即不再用於該領域，而“個”則可長期與其他量詞並行。這一區別主要是因為“枚”主要用於計量統計的語境中，而“個”多用於一般性敘述語境。計量統計語境數量是核心焦點，傾向於使用更清晰準確表明數量特征的量詞，專屬量詞顯然比泛指性的“枚”更符合要求；而在一般敘述性語境中這一要求則不強烈，所以語料中體現出“數+個+名”與“名+數+專屬量詞”並行的情況。

3. 量詞“枚”與“個”的發展過程與漢語個體量詞系統的形成發展密切相關。如下表所示：

個體量詞發展階段	“枚”發展階段	“個”發展階段	個體量詞數量	個體量詞使用情況	其他
先秦（萌芽）	萌芽	萌芽	極少	極少使用	
兩漢（發展）	發展	空白	>50	可用可不用	個體量詞初步分工
六朝（興盛）	興盛	發展	>120	部分必須使用	分工細化、固定化、範疇化
隋唐五代（成熟）	衰落	興盛	>150	基本上必須使用	形成完整系統以及相應生成機制

個體量詞萌芽於先秦時期，出現的極少數個體量詞基本上是與常見的集體量詞相對，表示單一數量的詞，主要出現在計量語境中，量詞“枚”萌芽於這一時期，也主要用於計量數量；到兩漢時期表物體形狀特征的量詞逐漸產生，個體量詞出現了初步分工，但仍有很多需要經常性計量的名詞沒有合適的量詞，“枚”就被用來滿足這一要求；到六朝時期使用量詞成為常態，個體量詞數量激增，但尚未發展完善，未與名詞形成固定關係，仍有大量空白區域需要“枚”滿足需求，這一時期“枚”達到發展的頂峰，主要用於稱量形狀特征不鮮明難以歸類，或是暫時還沒有專屬量詞的事物；到隋唐以後，隨著個體量詞系統的完善，新興量詞逐步完成範疇化，與名詞形成固定關聯，“枚”就失去了其基本作用，只作為“錢”等的專屬量詞而存在。

量詞“個”雖也萌芽於先秦，但其與“匹”、“輛”等個體量詞不同，語義上並不強調單件物體數量，也不只用於統計數量的語境中；到六朝時期口語文獻中基本上必須使用量詞，“個”在一般性敘述文字中被隨意用於包括“人”在內的各類名詞，它一方面與“枚”一樣填補了部分空白，填補了敘述性語境中常見的“數量+名”結構中尚未形成固定量詞的空白，一方面也在不強調數量的語境中代替固定量詞削弱數量的焦點特征；到隋唐以後，雖然形成了完整的量詞系統，但量詞“個”的使用空間仍然存在，一方面難以通過一般機制生成專屬量詞的抽象事物，新興的暫時沒有固定量詞的事物都需要量詞來稱量，一方面在不強調數量的語境中也仍需要泛指性量詞替代。

4.量詞“枚”與“個”的發展同漢語數量結構的演變密切相關，如下表所示<sup>23)</sup>：

個體量詞發展階段	“枚”發展階段	“個”發展階段	數量+名：名+數量	名+數：名+數量
先秦（萌芽）	萌芽	萌芽	《國語》13：36	30：36
兩漢（發展）	發展	空白	《漢書》74：1712	785：1712
六朝（興盛）	興盛	發展	《三國志》41：98	180：98
隋唐五代 （成熟）	衰落	興盛	《唐五代卷》351：174	0：174

23) 因“數+名”結構涉及情況複雜，始終保持了較高的使用頻率，所以表中僅統計了“名+數”與“名+數量”結構的比例，試圖說明“名+數”結構的消亡。

在先秦早期“名+數”用於數量結構為焦點的統計語境中，“數+名”用於一般性敘述語境中，量詞系統形成之初量詞尤其是個體量詞主要用於數量結構為焦點的統計語境中，因而也主要出現在“名+數量”結構中，極少出現“數量+名”。隨著個體量詞系統的形成，要求必須使用量詞，這就使得用於一般性敘述語境中的“數量+名”使用得越來越多。

量詞“枚”主要用於計量統計語境，因而也主要出現在“名+數量”的語境中，其自兩漢直至六朝“名+數量”結構占絕對優勢，“枚”隨著“名+數”直接結合比例的降低，而逐漸發展、興盛，到隋唐以後隨著“數量+名”結構成為優勢語序結構而衰落；量詞“個”主要用於敘述語境，因而也主要出現在“數量+名”結構中，直到六朝出現頻率都不高，直到六朝以後，隨著“數量+名”結構成為優勢語序結構而迅速發展興盛。

### 【參考文獻】

- 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書局，1965。
- 米建霞《近代漢語通用個體量詞“個”的歷時研究》，北京語言大學碩士論文，2009。
- 王大瑩《後漢書量詞研究》，西南大學學位論文，2010。
- 汪祜《中古佛典量詞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學位論文，2008。
- 夏宇《華陽國誌量詞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學位論文，2008。
- 黃平《漢藏語數量名結構語序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 李建平《先秦兩漢量詞研究》，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 陳絨〈從“枚”與“個”看漢語泛指性量詞的演變〉；《語文研究》2002年1期。
- 貝羅貝〈上古、中古漢語量詞的歷史發展〉；《語言學論叢》21輯，商務印書館，1998。
- 麻愛民〈試論“數量名”結構的來源〉；《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3期。
- 王紹新〈量詞“個”在唐代前後的發展〉；《語言教學與研究》1989年2期。
- 吳婷婷〈量詞“個”的歷時發展及其表量泛化的原因分析〉；《文學界：理論版》2010年8期。
- 遊汝傑〈漢語量詞“個”語源辨析〉；《語文研究》1985年4期。
- 張萬起〈量詞“枚”的產生及其歷史演變〉；《中國語文》1998年3期。
- 張義〈漢語通用量詞“枚”與“個”的嬗變〉；《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2期。
- 張誼生〈從量詞到助詞——量詞“個”語法化過程的個案分析〉；《當代語言學》2003年3期。
- 焦毓梅〈泛指性量詞“枚”的歷時演變研究〉；《中國語文學志》51輯，2015。

### 【英文提要】

This study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Generic Referring Quantifiers Mei(枚) and Ge(个). Observing their diachronic developments in detail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Tang Dynasty, it concludes that Mei(枚) and Ge(个) come not from the extension of the relevant Classifiers but are generic referring quantifier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Both of them begin in the Pre-Qin Period, Mei(枚) is mainly for ensuring the number of items, Ge(个) is mainly for narrations. After ente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ree words(个、介、箇) have merged into one quantifier: Ge(个), so the quantifier can be used in larger extension, and can be used in noun-num-measure structure and num-measure-noun structure. Mei(枚) was still mainly for ensuring the number and only used in noun-num-measure structure.

### 【主題語】

통용, 양사, 유별사, 비교, 변화, 매(枚), 개(个)

泛指性, 量詞, 類別詞, 比較, 歷時發展, 枚, 個

Generic Referring, Quantifiers, Classifiers, Compare, Diachronic Developments, Mei(枚), Ge(个)

투고일: 2016. 1. 15 / 심사일: 2016. 1. 20~2. 5 / 게재확정일: 2016. 2. 15